

【名著百部】

中国现代文学

钟理和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钟理和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刘亚铁 编选

华夏出版社

目 录

短篇小说

原乡人	3
逝	14
校长	20
浮沉	28
竹头庄	40
山火	51
阿煌叔	62
亲家与山歌	71

中篇小说

门	83
---------	----

散 文

新生	135
----------	-----

夹竹桃	145
贫贱夫妻	186
同姓之婚	197
奔逃	209
复活	219
假黎婆	231
初恋	242
烟楼	254
苍蝇	264
钱的故事	269
阿远	277
阁楼之冬	289
杨纪宽病友	300
生与死	311
老樵夫	319
还乡记	329
雨	334
钟理和小传	403
钟理和主要著作书目	405

短篇小说

原 乡 人

一

我幼年时，登上我的人种学第一课的是福佬人（闽南人）。这人是我父亲商业上的朋友。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常常到我家来，在我家吃过一餐午饭，然后就走。但有时也会住下来，第二天才走。他人很高，很会笑。如果在我家住下来，那么，第二天要走时准会给我和二哥一角或二角钱；大概人还很好。待我年纪渐长，我才又知道有不少福佬人会到我们村子来做生意，妈时常由他们手里买咸鱼、布或绉线。这时，我也懂得点福佬话了。

人种学的第二种人是日本人。经常着制服、制帽，腰佩长刀，鼻下蓄着撮短须。昂头阔步，威风凛凛。他们所到，鸦雀无声，人远远避开。

“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

母亲们这样哄骗着哭着的孩子。孩子不哭了。日本人会打人的，也许会把哭着的孩子带走呢！

二

六岁刚过，有一天，奶奶告诉我村里来了个先生（老师）是原乡人，爸爸要送我到那里去读书。但这位原乡先生很令我感到意外。他虽然是人瘦瘦的，黄脸，背有点驼，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和我们

有什么不同。这和福佬人日本人可有点两样。他们和我们是不同的。放学回来时我便和奶奶说及此事。奶奶听罢，笑着说道：我们原来也是原乡人；我们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

这事大大出乎我意想之外。我呆了好大一会儿。

“是我爸搬来的吗？”停了会儿我问奶奶。

“不是！是你爷爷的爷爷。”奶奶说。

“为什么要搬来呢？”

“奶奶也说不上。”奶奶遗憾地说，“大概是那边住不下人了。”

“奶奶，”我想了想又说，“原乡在哪边？是不是很远？”

“在西边，很远很远；隔一条海，来时要坐船。”

原乡，海，船！这可是一宗大学问。我张口结舌，又呆住了。奶奶从来就不曾教过我这些东西。

第二年，先生换了人。据说也是原乡人，但和前一个完全两样。他人微胖，红润的脸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颊有颗大大黑黑的痣，声音洪亮。比起前一个来，这位原乡先生已神气多了。只是有一点：很多痰，并且随便乱吐。还有，喜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时村里几乎家家都养狗，要吃狗肉是极随便的。因此不到两年，他的身体更胖了，脸色更红了，但痰更多了。

他宰狗极有技巧。他用左手的拇指及食指捏着狗脖子，右手拿刀往狗脖下一划；小狗谄谄地在地上爬行几步，然后一踉跄。于是一连三只。他又教人如何用狗尾翻肠子，真是再好再方便不过。

他在我们村里教了三年书，后来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百方医治无效，便卷了行李走了。但据说，后来死在船上，尺首被抛进海里。村人都说他吃狗肉吃得太多了，才生那个疮的。不过他教学有方，且又认真，是个好先生，因而村里人都很以为惜。

八岁时，因为入学校读日本书，我就不再读村塾了。

我第三个认识的原乡人，也是和狗肉结下不解缘的。但令我

不解的，他并不是外处人，据我所知，却是从来就住在村子里。他有老婆，都已上了年纪了；有一个女儿。他眼睛不好，手脚有点颤抖，但打起狗儿来却凶狠而勇猛。遇着他杀狗时，村里大人小孩都把他围成一圈。他家门口有株木棉树，他就把他的狗系在树头下，两手挥起杯口粗的木棍使尽力气向狗身上打下去。他的眼睛的不灵，使他的木棍不能每次都击中要害，很快结束狗的生命；唯其如此，徒然增加了狗的痛苦。狗在绳子许可范围内闪来闪去，踉跄挣扎，叫得异常凄惨，血顺着它的舌头、嘴唇滴落。全村的狗都着了魔似的疯狂地吠着，但围看的人却屏声静气，寂然不动。二哥叫我不吐唾沫，并要把两只手藏在身后。

红的血和疯狂的犬吠，更刺激了打狗者的杀心，木棍击落：叭啦！叭啦！突的，狗的脑袋着了一棍，蹶然仆地；鼻孔，眼睛，全出血了。狗的肚子猛烈地起伏，四肢在地上乱抓一转。狗挣扎着又爬了起来。但无情的木棍又击下去了。

我紧紧地靠着二哥。二哥一手挟抱我的脑袋，鼓励我“不要怕！不要怕！”一声凄绝的哀号过后，我再睁开眼睛，只见那可怜的动物直挺挺地躺在血泊里，肚子起伏得更快更凶猛，四肢不住抽搐。

二哥终于把我带走了。

有几个大人聚坐在斜对过、村铺前的石垣上谈论此事。

“多狠！”一个人这样说。又有人问是谁家的狗。据他的意思，以为给他狗的人家也和他一样狠心。

“他给他们钱呢！”另一个人说。

“给他们多少钱？”对方反驳道，“要是我，就是给再多钱，我也不干。”

“原乡人都爱吃狗肉。”又有人这样感喟地说。

他——那位杀牲者——是原乡人，这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回到家里，我劈头问奶奶：“我爷爷吃不吃狗肉？”

“不吃！”奶奶说。

“我爷爷的爷爷呢？”

奶奶诧异地看着我，微笑地说：“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他一定是不吃狗肉的。”然后奶奶问我怎么要问这些事。

我将所见的事向她说明，然后告诉她：他们说原乡人都爱吃狗肉。

“傻孩子，我们可不是原乡人呀！”奶奶说。

“我爷爷的爷爷可是原乡人，这是奶奶说的。”

“他是原乡人，可是我们都不住在原乡了。”

我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不吃狗肉，这事确令我很满意，但是奶奶对于“我们是那种人”的说明，却叫人纳闷。

后来我又看见了更多的原乡人，都是些像候鸟一样来去无踪的流浪人物，而且据我看来，都不是很体面的：卖蓼的、铸犁头的、补破缸烂釜的、修理布伞锁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师（堪舆家）。同时我又发觉他们原来是形形色色，言语、服装、体格，不尽相同。据大人们说，他们有宁波人、福州人、温州人、江西人。这的确是件怪事。同是原乡人，却有如许差别！但对此，奶奶已不能帮我多少忙了。除此不算，我觉得他们都神奇、聪明、有本事。使破的东西经他们的手摸摸，待一会儿全变好了。我看主妇们收回她们的东西都心满意足，可见他们修补得一定不错。

最令我惊奇并感到兴趣的，是铸犁头的一班人。他们的生意，不像平常人是在白天干的，却是在夜间干的。他们人数多，块头大，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肩挑重负，头戴宽边大竹笠；这些儿他们也可以当扇来扇刚出模的火红犁头的。他们到了村子，便摇着铁片哗啦哗啦地各处走着，向人家收集破犁头。夜幕一落，他们便生火熔铁；一个人弓着背拉着风箱，把只熔炉吹得烈焰融融。一个人

把铸模承着炉口，拿只钳儿把炉子一倾，赤热的溶液自炉口流进模里，火里四射，煞是可怕，但那人毫无惧色。他袒胸，脸上流汗，用每个身当重任的人所有的那种无比的坚毅、冷静和沉着，做完一切。炽红的火光用雕刻性的效果，把他的身躯凸现成一柱巨人。这场面慑住了我的思想。我觉得他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日我清早起来时，他们已经走了，场地上留下一堆煤的烧渣。它烧成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东西，丰富了我们的玩具箱。

三

待我年事渐长，我自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本叫做“中国”，原乡人叫做“中国人”；中国有十八省，我们便是由中国广东省嘉应州迁来的。后来，我又查出嘉应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县了。

到公学校（如今的国民小学）五六年级，开始上地理课；这时我发觉大陆又变成“支那”，大陆人变成了“支那人”。在地图上，大陆和台湾一衣带水，它隔着条海峡向台湾划着一条半月形弧线，自西南角一直划到东北角。我没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它比起台湾不知要好几百倍。但奶奶却说我爷爷的爷爷因为原乡住不下人才搬到台湾来的。这是怎么说的呢？

日本老师时常把“支那”的事情说给我们听。他一说及支那时，总是津津有味，精神也格外好。两年之间，我们的耳朵便已装满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各种名词和故事。这些名词都有它所代表的意义：支那代表衰老破败；支那人代表鸦片鬼，卑鄙肮脏的人种；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负责等等。

老师告诉我们：有一回，有一个外国人初到大陆，他在码头上掏钱时掉了几个硬币，当即有几个支那人趋前拾起。那西洋人感动得尽是道谢不迭。但结果是他弄错了。因为他们全把捡起的钱

装进自己的衣兜里去了。

然后就是支那兵的故事。老师问我们：倘使敌我两方对阵时应该怎么样？开枪打！我们说。对！支那兵也开枪了。但是向哪里开枪？向对方，我们又说。老师诡秘地摇摇头：不对！他们向天上开枪。这可把我们呆住了。为什么呢？于是老师说道：他们要问问对方，看看哪边钱拿得多。因为支那兵是拿钱雇来的。倘使那边钱多，他们便跑到那边去了。

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没完的，每说完一个故事，老师便问我们觉得怎样。是的，觉得怎样呢？这是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老师的故事，不但说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决定自己该不该相信。

我重新凝视那优美的弧线。除开它的广大之外，它不会对我说出什么来。

四

同时，父亲和二哥则自不同的方向影响我。

这时父亲正在大陆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视一趟。他的足迹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岛、胶州湾，下至海南岛。他对大陆的见闻很广，这些见闻有得自阅读，有得自亲身经历。村人们喜欢听父亲叙述大陆的事情。原乡怎样，怎样，是他们百听不厌的话题。父亲叙述大陆时，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今没落的舅舅家，带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叹息。因而这里就有不满、有骄傲、有伤感。

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但现实的舅舅家却令他们伤心，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原乡！原乡！”

有一次，父亲不辞跋涉之劳深入嘉应州原籍祭扫祖先，回来时

带了一位据说是我远房的堂兄同来。村人闻讯，群来探问“原乡老家”的情形。父亲摇了半天头，然后又生气又感慨地说：地方太乱，简直不像话；又说男人们强壮的远走海外，在家的又懒、又软弱。像堂兄家，父亲和两个哥哥都走南洋，如今他又来台湾，家里就只剩下三个妇人——一个老婆婆和两个年轻儿媳；再有，则是几个小孩了。大家听着，又都叹息不止。

后来父亲对海南岛大感兴趣，曾有和族人集体移民到榆林去捕鱼的计划。他先去视察了两趟，觉得满意，然后第三次邀了四位族人同往。他们准备如这次视察也能满意，回来后即把计划付诸实现。但没想他们的汽车自海口出发后第二日便中途遇匪，在一个小县城困守十多天，饱受一场虚惊，终于不得不取消视察，败兴而返。希望幻灭，父亲和族人就此结束了发财的美梦，从此绝口不提海南岛和捕鱼的事情了。

同年末，上海传来坏消息：公司倒了。父亲席不暇暖的匆匆就道。回来时，那是又暴躁、又生气、又伤心，言笑之间失去了往日快乐和藹的神采，经过很久才得恢复正常神态。

五

但真正启发我对大陆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高雄中学时，曾为“思想不稳”——反抗日本老师，及阅读“不良书籍”——“三民主义”，而受到两次记过处分，并累及父亲被召至学校接受警告。

中学毕业那年，二哥终于请准父亲的许可，偿了他“看看大陆”的心愿。他在南京上海等地畅游了一个多月，回来时带了一部留声机，和许多苏州西湖等名胜古迹的照片。那天夜里，我家来了一

庭子人。我把唱机搬上庭心，摇给他们听，让他们尽情享受“原乡的”歌曲。唱片有：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廉锦枫》、《玉堂春》，和马连良、荀慧生的一些片子。还有粤曲：《小桃红》、《昭君怨》；此外不多的流行歌。

粤曲使我着迷，它所有的那低回激荡，缠绵悱恻的情调听得我如醉如痴，不知己身之何在。这些曲子，再加上那赏心悦目的名胜风景，大大的触发了我的想象，加深了我对海峡对岸的向往。

我几次要求父亲让我到大陆念中学；父亲不肯。我又求二哥帮忙说项，但二哥说这事不会有希望，因为父亲对大陆很灰心。

父亲在大陆的生意失败后，转而至屏东经商；二哥也远赴日本留学去了。第二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举国骚然；未几，我被编入防卫团。堂兄回原乡去了。我和他相处数年，甚为和洽，此番离别，两人都有点舍不得。

战事愈演愈烈，防卫团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广：送出征军人、提灯游行、防空演习、交通管制。四个月间，北平、天津、太原相继沦陷，屏东的日本人欢喜若狂，夜间灯火满街飞，欢呼之声通宵不歇。

就在这时候，二哥自日本匆匆回来了。看上去，他昂扬而紧张，眼睛充血，好像不曾好好睡觉。他因何返台，父亲不解，他也没有说明。他每日东奔西走，异常忙碌，几置寝食于不顾。有一次，他领我到乡下一家人家，有十几个年青人聚在一间屋子里，好像预先有过约定。屋里有一张大床铺，大家随便坐着；除开表兄一个，全与我面生。

他们用流利的日语彼此辩论着，他们时常提起文化协会、六十三条、中国、民族、殖民地等名词。这些名词一直是我不感兴趣的，因而，这时听起来半懂不懂。两小时后讨论会毫无所获而散。二哥似乎很失望。

同日晚上，二哥邀父亲在我隔壁父亲卧室中谈话。起初两人

的谈话听起来似乎还和谐融洽,但是越谈两人的声音越高,后来终于变成争论。我听得见二哥激昂而热情的话声。然后争执声戛然而止。二哥出来时怏怏不乐;两只眼睛仿佛两把烈火。是夜,我睡了一觉醒来,还看见二哥一个人伏在桌上写东西。

数日后,二哥便回日本去了。临行,父亲谆谆叮嘱:你读书人只管读书,不要管国家大事。父亲的口气带有愧疚和安慰的成分。但二哥情思悄然,对父亲的话,充耳不闻。

二哥再度自日本回来时,人已平静、安详,不再像前一次的激动了。这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时局渐呈胶着状态。二哥说日本人已在作久远的打算;中国也似决意抗战到底,战事将拖延下去。他已决定要去大陆。很奇怪的,父亲也不再固执己见了,但也不表高兴。

我和表兄送二哥到高雄;他已和北部的伙伴约好在台北碰头。一路上都有新兵的送行行列。新兵肩系红布,频频向人们点首微笑。送行的人一齐拉长了脖子在唱陆军行进曲。

替天讨伐不义,
我三军忠勇无比,

.....

二哥深深地埋身车座里,表情严肃,缄默不语。我平日钦仰二哥,此时更意识到他的轩昂超越。我告诉他我也要去大陆。二哥微露笑意,静静低低地说:好,好,我欢迎你来。

二哥走后不久,宪兵和特务时常来家盘查他的消息。他们追究二哥到哪里去及做什么事。我们一概答以不知。事实上二哥去后杳无音信,我们连他是否到了大陆也不知道。

六

防卫团的职务要辞辞不掉，要摆摆不脱，着实令人烦恼。我曾以素有胆石病为由向团长请辞，但不为允许。团长是一位医生，他解开内衣让我看看他开刀后的疤痕，然后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胆石开刀不难，只要我愿意，他也可以为我效劳。

有一次防空演习，防卫团一半人管制交通，另一半人分区监视全街的灯火。时间已过午夜十二时。我们那一区忽然发现有一线灯光。我们——我和我的伙伴，按着地点很快就找出漏光的人家了。那是一间糕饼铺，老板出来应门没有把遮光布幕遮拢，以致灯光外漏。

我们以情有可原，只告诫了一番之后便预备退出。但此时一个有一对老鼠眼的日本警察自后面进来了。他像一头猛兽在满屋里咆哮了一阵，然后不容分说把老板的名字记下来。

“那老板是唐山人(闽南语。即客家人的原乡人)。”

回到监视台上，我的伙伴说，他是“老屏东”，知道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唐山人？那他怎么不回唐山去呢，都战争了？”我也用闽南语问他。

“他舍不得嘛，他这里娶了老婆，又有铺子！”

然后他又告诉我前些时捐款时，这位老板没有捐到日本人所希望的数目，因此日本人对他很不满。这次他可能会吃苦头。

我们由此谈到这次的中日战争。这位伙伴认为中国打胜仗的希望甚微。

“战争需要团结，”他说，“可是中国人太自私，每个人只爱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翌日，我们在警察署聚合。忽然有一个人自司法室摇摇摆摆地爬上停在门口的一辆人力车，仿佛身带重病，垂头丧气，十分衰弱。那人矮矮的身材，微胖。在人群中，我和昨晚的伙伴默默地互看了一眼。只有我们两人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车上的正是漏光的糕饼铺的老板。

目送远去的人力车，我不觉想起伙伴所说的话：他是应该回去的！

当日黄昏时分，我独自一人坐在公园水池边，深深感到寂寞。我的心充满了对二哥的怀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到了重庆，此刻在做什么。失去二哥，我的生活宛如被抽去内容，一切都显得空虚而没有意义。我觉得我是应该跟去的；我好像觉得他一直在什么地方等候我。

“欢迎你来！欢迎你来！”二哥的声音在我耳畔一直萦绕不绝。

七

其后不久，我就走了——到大陆去。

我没有护照；但我探出一条便道，先搭船到日本，再转往大连；到了那里，以后往南往北，一切都随你的便。

我就这样走了。

我没有给自己定下要做什么的计划，只想离开当时的台湾；也没有到重庆去找二哥。

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二哥如此，我亦没有例外。

（选自《原乡人》，1976年，台北远行出版社）